

总 论

东南沿海地区习指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上海四省一市地区。这一地区处于中国大陆东南缘，面向辽阔的海洋，背倚广袤的腹地，是中国的精粹膏腴之地。

东南沿海城市，南起广州、澳门、香港，中经汕头、潮州、漳州、厦门、石狮、泉州、莆田、福州、瑞安、温州、宁波、杭州，北至上海、连云港，宛如一串璀璨的明珠，散布在新月形的海岸线上，构成一组特色鲜明的城市系列。

这些城市的历史、规模，参差不齐，有的久远，有的年轻，有的硕大，有的小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外部世界联系越密切，中国对外开放度越大，这些城市越繁荣。

当历史翻到近代一页时，当内陆城市昨日辉煌不复存在、运河城市繁盛气象日趋式微之时，东南沿海城市虽屡遭欺凌，迭受创伤，但老城新生，新城崛起，巨埠耸立，大港庞然，形成包括国内首位都市、全国外贸中心、区域经贸中心等功能互补的组合式城市带，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更使这些城市平添生气，活力大增，辟特区，建大港，引外资，新招迭出，气象万千，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东南沿海城市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扮演着联系中外的桥梁、吸收外资的基地以及先行官、排头兵、试验场等诸多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其特点，其地位，其走向，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全国重视，世界注目，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本书无法对上面述及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作系统的研究，我们只是选择了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即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作为剖析的对象。

一、自然地理与历史概况

自然环境(地形、气候、水文、土壤)制约着人的生理机能、地区植被构成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发祥于黄河中、下游，东南五口所在地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最初的农业和定居聚落的出现使先民结束采集、渔猎、居无定所的谋生方式从那些依河傍湖的村落中诞生了城市的雏型。东南五口所在地自然地理条件的相似之处在于：

(1)地处沿海冲积平原，气候温暖湿润，适于农业生产。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缘，宁波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福州在闽江下游福州平原，广州跨珠江三角洲的珠江两岸，厦门是闽南沿海岛屿。福州平原与厦门邻近的九龙江下游平原是福建最主要的平原，珠江三角洲是广东最大的平原，耕地分布相对集中。宁波、福州、广州所在地区，均是省内经济开发先行地区。得益于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这些地区农作物一般一年两熟或三熟。

(2)拥有河海交汇、地理位置优越的天然良港。上海处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西接太湖流域进入运河系统，东经长江口入海，居中国大陆海岸线中点，为南北沿海航运中枢；宁波位于余姚江、鄞江汇合地，西有浙东运河（宁波至萧山）横贯宁绍平原，东流入海，河海航运两便；福州居省内海岸线中点，沿闽江西行，可进入占全省土地面积 63.8%的腹地，厦门扼闽南九龙江出海口，为大陆与台湾航运孔道，广州当珠江三大支流（东江、西江、北江）汇集处，循西江可进入广西，由珠江顺流约 70 公里出海。

由于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将亚洲大陆分为东亚和西亚两大部分，这两部分在地质、地貌、气候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东亚部分由中国大陆及太平洋西部的众多半岛、群岛组成。近代以前，在这

一广阔的范围里，中国大陆的农业生产以精耕细作的技术特色和家庭经营方式为基础，长时期居领先地位，并成为区域文明中心。于是，由中国大陆和近海岛屿构成的海上贸易圈，就相应成为中华文明辐射圈的范围。东南五口成为中国大陆与东亚岛屿之间交往的通道。在以海洋为纽带的国际贸易网络中，这五口便成了太平洋西海岸亚洲大陆的东南门户。

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生活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特定的物质生活方式。比较一下新石器时期两处遗址：甘肃马家窑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日后的变迁，不难发现前者在相对贫困、艰苦的环境中，人类的生活水平始终极低，而后者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的早期开发和航运便利，刺激了人口聚居繁衍，使五城市相应成为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从五城市历史变迁看，可归纳为三个特点：

(1) 五城市地处或邻近农业开发先行区域，具有综合开发的明显优势。耕地相对集中，人口比较密集，治水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海潮的侵袭和江流的泛滥，这形成五口所在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相对优势。治水工程在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主要有隋代大运河的开凿，公元 8 世纪初海塘的修筑（北起盐城到南通，南由吴淞口至浙江海宁），10 世纪太湖下游入江水道的疏浚，沿河筑堤，开凿沟渠。在宁波地区有唐代它山堰的修筑，灌溉农田数千顷，南宋时从宁波至杭州的浙东运河的开凿。在广州是修水利，筑堤围。治水工程对江南地貌有所改变，从根本上改善了江南农业生产条件，使得“蓄泄有时，旱涝无虞”，耕作趋于集约，到 11 世纪江南漕米已经北运。治水工程也便利了南北航运，使种植业的商品化生产得以发展。宋元以后因蚕桑、植棉继起，长江三角洲已是国内丝织、棉纺织手工业基地。上海地区在宋代呈现“原泽沃衍，有渔稻海盐之富，商贾辐辏”的景象，松江号称“文物财富甲于东南”。珠江三角洲因河网纵横，堤围密布，在唐代已粮食自给有余，为粤地主要

产粮区和水果产地,鱼塘、桑基、蔗基经营渐趋发达。清中叶的广州府以兼“鱼盐之利,水陆之产”而著名。治水的成功,使汉唐以前还地僻人稀的东南沿海地区,逐步繁盛起来。

(2) 由于资源分布特点不同,宁波、福州、厦门地区的早期开发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调剂,优势互补。清初,宁波府辖六县,拥有省内主要的盐场(慈溪)、渔场(象山),并且是重要的茶叶基地,但粮食无法自给。福州府地狭人稠,粮食亦难自给,而且不宜蚕桑,不工纺织。厦门耕地甚少,粮食每靠台湾运来。当然,这些地方的资源有少也有多,有短也有长,这就为区际贸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宁波地区所产鱼、盐、竹、木、茶是参与浙东区域商品交换的大宗,宁波成为浙东的海港,福州是其腹地的木材、茶叶出口的门户,闽江流域森林面积居全省之半,闽北是省内首位产茶区。作为厦门腹地的闽南地区,水果丰盛,茶叶也不少。

东南五口的这些资源特点,推动着这些地区开拓更大范围的区域贸易与海上贸易。明清时期江南土布、丝绸、福建茶叶生产已具相当规模,不仅是参与国内贸易的大宗,而且是主要出口商品。广东蔗糖生产始于唐代,明清已有外销。闽粤则需输入米和棉花。资源互补,区域合作,使五口所在地区农业发展由生存农业逐渐向商业化经营过渡。

(3) 五城市在不同层次区域市场首位商港地位已经确立。上海是长江、运河、南北沿海贸易的转运中枢,太湖流域最大的商港。宁波是浙东物资集散中心。福州、厦门分别是福建北南两个最大的贸易口岸。广州藉珠江水系枢纽地位,是两广地区最大的河港兼海港。从五城市的贸易网点分布看,除上海之外,大多与内陆地区经济联系有限:广州可经西江进入广西,福建河运系统基本限于省境(汀江为唯一省际河道),宁波西路的浙东运河与杭嘉湖平原的钱塘江相距 5 公里,而钱塘江又与大运河水系相距十几公里。在河道即商道的时代,城市商业拓展往往以可通航的河流为前提,因此,

四个城市区域市场的发展优势主要在沿海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邻国），上海则兼有双重优势。

尽管浙、闽、粤绝大部分沿海属沉降型海岸和岩岸，天然良港较多（与江苏北部海蚀平原海岸、冲积海积平原海岸暗沙连绵，为航海禁区相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东南沿海地区海港资源的经济价值在近代以前远未充分开发。

二、东南五口在传统社会的地位

城市的出现是对农村生活的改造，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体现了区域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中国传统社会曾拥有像内陆城市、运河城市等特色鲜明的系列城市，东南五口则有别于此，他们在传统社会的地位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1）东南五口在封建时代被赋予区域行政中心、东南门户的角色。中国古代城镇起源于人口聚居、物物交换地或贵族封地、防御要塞。自秦实行郡县制后，城镇发展在数量、分布上与行政网络的建立和区域经济开发同步。秦在战国发展基础上设 46 郡、八九百县，较大的城镇 250 个^①，比春秋时代增加一倍。广州、福州因成为郡（县）治所而呈现城的最初轮廓。宁波在唐代，上海在元先后加入州（县）治所行列。这四个城市被纳入王朝行政系统后延续未变，其中广州、福州升至区域首位政治中心，平南王的加封、拱北楼之设是其负有辖地守疆使命的象征。厦门是在明代以后崛起的，这一地区在宋元以前对外门户的角色，是由厦门的邻居泉州充当的。

作为封建王朝的东南门户，五城市或被指定为海上对外交往出入口岸（广州）或作为防御要塞（厦门、宁波），在明清两代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四口曾被辟为“通洋正口”，代皇室采办洋货，禁通番、征私货、抑奸商是这些朝贡贸易口岸的主要职责。朝贡贸易的

主旨不是追求交易之物的经济价值，而是交易本身的社会价值。以朝贡贸易为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体现了封建王朝严守夷夏之辨的文化排他性。

(2) 东南五口航运枢纽作用在自然经济时代未能充分发挥。商埠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数量极为有限。先秦的商业城市计二三十座，占城镇总数的 $1/4$ 。汉代六七十座城，比秦增加一倍，商业名城仅 8 座，分布已由黄河流域南进，以渤海湾、长江三角洲、杭州湾相对密集。此类商埠多属本地区的土特产集散地、手工业中心，市场有限。隋唐运河城市崛起，形成跨地区南北商品流通网，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四大商城。宋元以后，虽有东南沿海商埠继起，但运河仍然是中国大陆的首位商路，运河城市作为系列商埠的榜首地位未曾动摇。明初国内 33 个大中型工商城市中，运河附近占 $1/2$ ，长江流域次之，沿海地区居三。因商业繁华而享誉的苏州、杭州、汉口、景德镇、朱仙镇、佛山也无一是沿海城市。限于朝贡贸易制度和海禁、迁界的政策干预，东南沿海五城市在开辟海外市场，沟通运河、长江与南北沿海、海外贸易方面的转运枢纽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展示。

(3) 明清时代东南五口充当了民间海商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经营基地。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分布自汉唐人口重心由北南移以来，持续增长：东汉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相比，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人口比率由 $83 : 16 : 1$ 转变为 $63 : 33 : 4$ 。唐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为人口重心已基本定局。宋代人口分布东西差异明显，清初人口重心偏东南，东南沿海各省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 100 人，呈现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明显规律，以江苏居首位。

地不敷口的沉重压力，刺激人口流动和分工趋细，引导乡民谋生方式向海洋拓展。在闽粤沿海地区出现向东南亚移民垦殖业的同时，东南五口相应成为民间海商最初的汇集地：上海客商以浙、

闽、粤为劲旅；“走广”使广州城西区为闽商聚居地，厦门商人多以挟货贩海为利藪。会馆作为封建时代中等以上城市常见的建筑，素以桑梓之情为纽带，以官宦、科举为基础，但在东南五口却与商港共存共荣。沿海埠际贸易和海外远程贸易的开拓，加快了五口财富积累与集中的进程，使广州十三商行跃居商界首位，上海沙船商称雄南北洋，厦门由军港而添商港之象。五口成为中国大陆参与太平洋西海岸东亚、东南亚贸易圈的重要商港，构成了运河系列商埠以外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城市。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流露了古代中国人对一种东南生活方式的仰慕。以五口为主要经营基地的民间海商，率先转向更富有诱惑和挑战的生活方式。由治水而闯海象征五口地区居民对资源利用日趋合理、象征着人文精神的提升。近代以前民间海商在东南五口的经营，以其沟通海外贸易与连接大陆区域贸易网的双重优势，在商品进出类别、总量、市场范围方面已居全国前列。因此，东南五口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商业革命的孕育，创造了相对优越的内部条件。

(4) 开埠以前东南五口已被英国列为在中国开拓商路的目标。16 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信息、运输和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原来分片分块、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区逐渐被联成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明清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相应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海外贸易的远东市场。先有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继有荷兰人强占台湾。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经历一系列技术发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工场工业阶段，资本由机器而形成的价值增殖，与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劳动者人数成正比，市场拓展由国内延伸到远东。欧洲—印度—中国，英国的商品顺势东进。1786 年英制棉布试销广州，19 世纪 30 年代初期，进口棉纱在广州近郊引发骚动：乡民宣布要烧毁进入他们村庄的任何

进口棉纱“如有人从广州买洋纱入境,一经擒获,立即处死”^①。但是,巨大的利润,诱人的前景驱使英商利益集团千方百计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废止,英商转请政府干预解决对华贸易。鉴于中英商务处于不稳定、无保护状态,地方官任意扣收税饷,行商垄断贸易;鉴于中国法律禁止外国人携带妻室家属来华;鉴于“中国法律和欧洲法律全然异趣,不列颠臣民根本不能接受它的统治”,英商要求本国政府与中国签订通商条约;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贸易基地,藉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勒索、控制和干扰”。所谓“超乎一切的一桩紧要的事情是占有一处居留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列颠法律保护下,免得遭受那些半开化的汉人子孙的侵害”。英商在1840年的一封致侵华英军总司令的信中认为,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是最值得作为英国臣民居住和贸易的口岸。英国在马嘎尔尼使华要求开放沿海口岸通商遭拒半个世纪后,决定以武力打开对华贸易之门。屈辱的《南京条约》终于将东南五口的名字长久地联系在一起。

三、东南五口近代化的过程及动因

东南沿海五口在开埠前夕,在全国地位还不很显要,简而言之,可以用“三府二县”来概括,即五口之中有三口属府级城市,有两口还只是县级城镇。那时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就拥有37府9州2厅。广州一口曾被清朝廷规定为唯一的对外贸易的口岸,为广州府的所在地,也为广东省府所在地,地位稍高。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都还只是一个地区中心,经济辐射的能力还十分有限。例如,那时的宁波虽有“北至青齐,南至交广”,乃“东南之要会”的美称,但在浙江省而言,还是一个同绍兴、台州、温州、处州、金华、湖

① 转引自列岛《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3—64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41,转引自《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54—55页。

州、严州、衢州、嘉兴等府一样 是一个府级所在地 其地位在杭州之下。福州和厦门在开埠以前凭藉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分别成为我国东南沿海航运贸易网的重要转运点。福州为当时福州府的所在地，也为省府所在，地位稍高。厦门则仅是泉州府所辖范围内的一个县级城镇。上海，由于其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心，南北洋船只转运贸易的连接点，埠际贸易相对发达，号称“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但是，其实际地位近不能比苏州，远不能比南京。那时苏州为府治所在地，南京也是省府所在地一级的城市。上海仅为松江府所属的一个县。在清朝城市系统中，上述城市的行政和军事作用都远远超过其经济地位，这些沿海城市的人口虽然相对集中，但是城镇的人口绝对数不算太多，除了上海拥有人口 20 万以外，厦门全部人口不过 14 万，那时的广州人口也不算很多。五口城区也都比较狭小，城市近代化都还没有起步。

按照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东南沿海五口成了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在 1843 年 7 月 27 日开埠，厦门开埠时间是 1843 年 11 月 1 日，其次是上海，1843 年 11 月 17 日开埠，以后，宁波于 1844 年 1 月 1 日、福州于 1844 年 7 月 3 日相继开埠。广州虽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不久就宣布开埠，但由于广州人坚持反对洋人进城，英国等西方列强久久未能取得广州租借地，直到 1859 年广州沙面租界才基本议定。至 19 世纪 50 年代，依据中外不平等条约对外开放的口岸又有内陆新疆的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地。在 60 年代初，按照《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增开了潮州（后改为汕头）、天津、牛庄、镇江、汉口、九江、芝罘（后改为登州）、淡水、台湾（打狗、台南）等沿海和沿江城市，又增开了喀什噶尔、库伦等内陆口岸城市，形成了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第二批口岸。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世纪末中国对外开放口岸又增加了 27 个，至 1917 年前再增加 47 个，总数增加至 92 个。对外开放对这些的城市发展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是首批对外开放的东南五口。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势力进入东南五口以后，首先带来了这些城市的对外经济联系。

五口通商时期，英国继续维持着对华贸易的优势地位。直至 60 年代末，英国的对华进出口贸易仍占中国对外贸易的 92% 和 76%^①，对外贸易次于英国的是美国，那时美国的对华贸易比重还大大低于英国，但其增长的势头很快。老牌的西方列强如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势力虽然无可奈何地在衰退，但其商人也是间或插足五口的对外贸易。那时地位日趋重要的法国和德国，其商人更不时出现在东南五口的市场上。当时正在崛起的沙俄势力则在沿海口岸的茶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以上海为例，英国商人、美国商人、西班牙商人、法国商人都在开埠不久涌入上海市场，至少在 1850 年上海就有 119 个商人分属于不同的商业团体。就是像宁波这样对外贸易未能很快发展起来的口岸，开埠以后英、法、美、普鲁士、荷兰、挪威、瑞典等国也先来设立了领事或副领事，以便进行通商贸易。一些外国银行也先后在东南沿海各开放口岸设立了自己的分行或代理处。像著名的汇丰银行 1865 年在上海设立分行，1866 年即在福州、宁波设立代理处，1873 年又在厦门设立分行，1880 年在广州设立了分行，初步形成了辐射中国东南沿海的金融网络。这种对外经济联系在近百年中对东南五口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外来力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东南沿海五口的城市近代化进程。以城市市内交通为例，1845 年公布的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在 830 亩土地的租界里规划开筑东西干道 7 条，南北干道 3 条。其中像最早筑成的“劳勃渥克路（今福州路）宽度为 公尺多，原为外滩纤道的黄浦滩路宽度也为 公尺多，其余道路的宽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400 页。

度均在 7 公尺左右。这种大规模的城市道路的兴筑给时人以强烈的印象，他们对比旧城区狭窄局促的城厢小道，深感“洋场十里地宽平”的方便。在厦门，租界建立以后的西方洋行和商人既为扩充地盘而擅筑海堤，也使当时的海后滩一带道路交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一举措促使厦门地方政府加快填筑海滩、修建公路码头的进程。外国人在厦门租界和外国人居住地区内设立工部局之类的近代市政管理机构，成立各种下属机构分管城市市政道路、卫生等，在客观上推动了市政的近代化进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上海等城市的中国绅商发起以修路、筑桥、改善市政基础设施为重要内容的自治运动，其目标是向租界市政建设看齐，其原动力之一则是租界市政的刺激。

再次，外来力量在文化方面也刺激了东南沿海五口的文化近代化。他们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在五口建立教堂、设立医院、兴办学校、出版报刊、翻译书籍，通过多种形式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医院方面，著名的有广州惠爱医馆、博济医局，上海仁济医院、同济医院、广慈医院等。这些医院，对于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起了重要作用。西医在中国立足并且最终占据中国医学主导方面，教会医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教育方面，传教士及其他外侨从创办小学开始，发展到办中学、大学，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逐渐与外国一致。著名的学校有上海徐汇中学、中西书院、中西女中、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宁波女塾、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广州岭南大学、厦门毓德女学等等。这些学校的创办，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学校结构，引进了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于中国的教育演变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报刊和出版方面，西人在东南五口的作用和影响更大。翻开 20 世纪以前的西书出版目录，绝大部分新式出版机构设在东南五口，绝大部分西书和新式报纸刊物都是在东南五口出版的。著名的出版机构有墨海书馆、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美华书

馆、益智书会 著名的报刊有《中外新报》、《六合丛谈》、《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申报》、《点石斋画报》 著名的西书有《博物新编》、《全体新论》、《化学鉴原》、《地学浅释》、《谈天》、《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东南沿海成为近代中国所谓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新事物在这里出现，新思想在这里酝酿，新人物在这里产生。近代鼓吹变法、改革的知识分子，很多产生于东南五口及其所在地区，洪秀全、郑观应、王韬、何启、胡礼垣、陈虬、汤寿潜、宋恕、薛福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还可以举出一长串。如果将视野放宽到接受西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而成为中国某一方面著名人物的话，那么东南五口及其所在地区真可以算得上是人杰地灵了，上述人物不算，我们还可以举出李善兰、马相伯、吴友如、詹天佑、任伯年、李伯元、吴趼人、林纾、胡汉民、王国维、陈宝琛、胡适（应算上海人）、宋庆龄、鲁迅、钱玄同、郁达夫、穆藕初、黄炎培、张东荪、张君勱、梁漱溟……这两方面合起来，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才大军。很难想象，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如果少了这些人，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东南五口不但是接受西方经济、市政、文化影响的先行地区，也是中国政府、绅商进行近代化努力的先行地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努力即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就是从东南五口开始的，也是以东南五口为基地的。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基于我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统治者中一部分人士试图从“求强”开始，继之以“求富”，欲使国家走上“富裕”之路。洋务运动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及外交等一系列活动，其中不少活动曾直接对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据统计在 1865 年至 1890 年间，清政府共建立了洋务军工企业 21 个，其中有 6 个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五口中，它们分别是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的福建船政局、福州机

器局 广州的广州机器局、广州火药局、广东机器局。这些洋务军工企业规模以江南制造总局为最大，时间也最早，以后的“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诸厂次第兴建 实师上海之成规 ”^①。在这些企
投资

19

60

1872

19

1883—1884

5600

1889

25

代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以中国的早期近代教育为例，在 1895 年以前，洋务派兴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有 22 个，其中上海、广州就各有 4 个，福州有 2 个，几乎占总数的 1/2。上海的广方言馆、机器学堂、操炮学堂、电报学堂，福州的求是堂艺局、电气学塾，广州同文馆、广州实学馆、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广州水陆师学堂等都是其中比较著名者。

在洋务运动以后，特别是在 20 世纪，民族资产阶级及五口地方政府也曾对城市近代化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清末民初，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生成，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其阶级意识和主张已开始较清晰地表现出来。清末地方自治活动、城市近代化设施及近代城市管理方法的倡导等就是其表现。以上海为例，鉴于租界的飞速发展和华界的相对衰落，一些先进的地方绅商和知识分子就开始倡导“仿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①。先是 1900 年有闸北地方人士组成“闸北工程总局”。1905 年又有“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成立，其宗旨为“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立地方自治之基础”^②。1911 年上海光复后，改称上海市公所，直属沪军都督府。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不仅有部分市政建设、民政、地方税收和公用事业方面的管理权，还对工商、文教卫生等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在同一时期里，由于东南五口城市资产阶级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其它一些城市的城市自治运动未能较充分地开展，市民对市政建设的推动大多还不明显。

在国民政府时期，东南沿海城市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带动起来的其它行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加壮大。加上国民政府在其管辖的城市里也希望对城市的建设有所建树，城市的

李钟珏：《且顽老人七十自述》，第 206 页。

杨逸：《上海市自治志，各项规则规约章程》甲编，第 1 页。

面貌遂有较大改观。例如在厦门，1919 年开始就有林尔嘉等一批地方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厦门市政会”，会所设在厦门总商会内，负责市政工程的审议和筹款，设立市政局负责施工。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厦门市政会共计修筑路段 45 条 还兴建了公园、堤岸等，使市政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成为福建南部第一座具有现代风貌的城市。上海的情况更是如此。1927 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以后，市政府随即就开始了上海建设的规划。1929 年 又正式通过了“大上海建设计划”，分别对市中心区建设规划、道路规划、港口铁路规划、全市分区规划等作了安排。这一计划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振兴华界与外国租界抗衡的意图，不少建设思想和措施至今都还有可取之处。大上海计划从提出到抗战爆发为止，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市中心区域内和外围开拓和修筑了一些干道，建成了市政府新厦、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等一批公共设施 完成了 虬江码头第一期工程。虽然由于 1937 年日帝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大上海建设计划被迫中止，但它仍对城市的近代化有重要的影响。

说到推动东南沿海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广大华侨在这些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东南五口城市因其靠海对外，所以大多同华侨发生密切联系。或是这些城市四周为海外移民的故土乡里，形成了侨乡的特色；或受华侨侨汇或回国投资的影响，成为侨胞竞相投资的热点。可以说，近代广大海外侨胞对东南沿海城市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这也是东南沿海城市独有的优势。以厦门为例，由于当地每年侨汇数量颇巨，加上华侨回国投资，所以厦门的商业更形发达；由于移民的流动及投资，也推动了厦门近代航运业的勃兴；就是厦门的近代工业，华侨资本也占着极大的比重；华侨的汇款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和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厦门房地产投资热潮，使近代厦门的城市面貌有较大的改观。在广州，华侨资本对广州的投资占整个广东省的 37% 以上 即超过 1/3。这些华侨投

资推动了广州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海的情况更是突出。华侨对上海生产企业的投资几乎占华侨在国内投资的一半，且投资规模大，并带有综合经营的性质，形成了几家大的企业集团，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等著名大企业。在商业领域里，近代上海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无一不是华侨资本开设的近代企业。它们的创立，标志着上海商业近代化的一个新阶段。

四、特点 · 影响 · 沿海文明

东南沿海五口率先对外开放以后，城市的近代化都不同程度地获得启动，但是其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五口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①，而是形成了五口均有一定程度发展，上海一枝独秀的局面。

上海在开埠以前只是一个中等县城，城镇人口 20 多万，经过近 100 年的发展一跃而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都市，建国前人口达 500 多万。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不仅是全国进出口贸易的总汇，而且还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轻纺工业基地，交通运输的枢纽，也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

宁波曾是中国最古老的外贸港口，但在近代以前，宁波对外还是封闭的。1844 年 1 月正式开埠后，西方列强势力也随即进入宁波。但是，宁波的对外贸易并没有迅速地发展起来，这是由于宁波靠上海太近，加上宁波没有很大的经济腹地，不少土货都被上海港口所吸纳，宁波自然地成了上海的一个“卫星港”。甚至其人才、资金也大量地流向上海，城市化进程由此也受到影响。在对上海数量巨大的内贸的带动下，宁波的市内商业迅速繁荣起来。至 19、20 世纪之交，宁波已拥有 80 多种商业行业，从业人员达二三十万人。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624 页。

于其工业 则直至 1914 年时全市还不到 20 家企业。至建国前夕，宁波的工人数只有 7600 多名，工厂仅 484 家，其中真正符合工厂法的企业更少。对外联系的增强和商业发展也促进了城市文化教育的发展。宁波在 20 世纪以前时已有各种教会中小学 20 多所，至 1908 年宁波已有国人自办学校 290 所，数量居全省第一，还拥有一批女子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宁波书局的出版业务虽因木刻石印技术的淘汰而未见发展，但它们却又是上海商务、中华等著名书局的分销店，成为上海先进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点。

福州在开埠以前是福建的沿海重要城镇之一，开埠之后贸易也有所发展，福州地方在贸易上长期出超，主要是因为闽江水运可将福建山区的大宗土货运往国内和国外，茶叶对外出口有较大发展。但在 19 世纪后半期，对城市发展更有直接作用的却是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海防建设，为“求强”目的筹办的福建船政局不但是福州城市工业近代化的嚆矢，船政局所属学堂的教育也成为城市文化科技发展的摇篮，以至对福州城市日后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

厦门在开埠以前还只是一个由 130 多个小村庄组成的海岛型城镇，人口 20 多万，是一个国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在开埠以后，厦门的国内外贸易保持缓慢发展的势头。同外贸相比，对厦门城市发展影响更大的是厦门及福建南部持续不断的向海外移民，它对近代厦门的商业、航运业、金融业和城市建设等都有深刻的影响，以至厦门成为东南沿海城市中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商业城市。据 1935 年的一个统计，厦门拥有 63 个商业行业，共 5200 多家商业企业，从业人员达 28 万多人。相比之下，1936 年时厦门符合工厂法的工业企业却还只有制皂、铁制家具、汽水、糖等 21 家，工人数仅为 730 人，可见其不发达之一斑。

广州曾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进入近代以后，虽然在进出口数量上保持着一定增长势头，但在对外贸易量的比重方面经